

# 社会变迁视野中的社会分层研究

范海玲

(南京大学 哲学系, 江苏 南京 210093)

**摘要:**指出在社会分层研究中,有三种基本研究视角:从决定要素解析社会分层、在结构中把握社会分层和在社会变迁中把握社会分层。要考察集权社会和国家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分层结构,需要考虑到历史因素的变化,即在社会变迁中把握社会分层。本文以费正清的中国研究为范例,描述了社会变迁视野中的社会分层研究。

**关键词:**社会变迁;社会分层;中国研究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02)01-0111-05

社会分层研究是探讨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维度。当我们能够回答“社会是由哪些群体构成的?社会资源是如何在这些群体中分配的?不同群体之间的关系如何?”等问题时,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就已基本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了。所以,社会分层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的热点。如何研究社会分层,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研究角度。笔者试图以费正清的中国研究为范例,描述社会变迁视野中的社会分层研究。

## 一、社会分层研究综述

关于社会分层的讨论可追溯到古希腊哲学时代,在著名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有很多关于社会分层的论述。但真正有系统的社会分层理论探讨始于19世纪的卡尔·马克思。经过一个半世纪众多学者的努力,社会分层研究正日趋完善,走向成熟。在社会分层研究中,不同学者运用的概念、研究的方法和得出的结论各不相同,但大体看来,有以下三种基本研究视角。

1. 从决定要素解析社会分层 马克思和韦伯关于社会分层的经典研究不仅给后来的社会分层研究以极大影响,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今天的理论及相关研究基本上还是在这两个理论的框架内发展的。尽管这两个理论模式和分析框架对社会分层的本质、决定要素、形式等分别做了不同的理论解

释,代表了不同的理论取向,但两者把握社会分层的切入点是一样的,即寻找将社会划分为不同群体的标准。

在马克思的理论中,社会不平等源于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其实质是以财产为核心的生产关系。因为对生产资料占有关系的不同,任何社会都有两个最基本的社会群体,即占有生产资料的阶级和不占有生产资料的阶级,如奴隶社会中的奴隶主阶级和奴隶阶级、封建社会中的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与马克思探讨社会不平等产生的根本原因不同,韦伯认为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由三个要素所决定,即阶级、等级和权力。在韦伯的所谓阶级理论或经济权力分配中,财产占有和毫无财产仍然是一切阶级状况的基本范畴。但是,韦伯认为,纯粹的财产占有本身仅仅是真正“阶级”形成的初级阶段。真正导致共同行为和阶级利益的,归根结底是市场状况,人们对市场机会的占有是表现个人命运的共同条件的机制。因此,与市场机会结合并存的利益,才造就了“阶级”,阶级结构因而而是多层次的,而不仅仅是一个两分的结构。在韦伯看来,社会不平等还取决于所谓“等级”。等级不必然与某一种“阶级状况”相联系,而受到某种特定“荣誉”的制约。这种荣誉的实质是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表现在把“社会的”交往限制在排他性的“圈子”内,甚至内部完全封闭。等级作为

收稿日期:2001-10-25

作者简介:范海玲(1956-),女,江西九江人,中国哲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儒学研究。

一种垂直的社会序列,它带来一种被承认的更多的荣誉,以利于享有特权的阶级。[1]党派的行为旨在获得社会的“权力”,共同体内部的“统治”权力。党派的实力,个人在党派中的地位决定了个人权力的大小。所以,个人在阶级、等级和权力三方面的状况决定了他的社会地位。相同或相似社会地位的人们构成了一个社会群体,而社会群体之间则出现了层化现象。

2. 在结构中把握社会分层 20世纪初,许多学科都产生了结构主义的革命,要求打破“原子论式”的研究,而进行整体的研究。整体并不是各成分的简单总和,它比成分的总和还要多一些,即整体还有整体作为整体自己的性质。从整体出发来认识部分,实践证明是有成果的。甚至有些研究对象,只有一开始就从整体来研究才有可能。社会分层研究的另一基本视角即是在结构中把握社会分层,也就是把社会分层研究置于整体社会结构之中。这一基本视角又可以区分为“地位结构观”和“网络结构观”。

“地位结构观”认为,客观、普遍的社会地位构成了社会分层结构的基本要素,这种社会地位外在于个人,决定了个人对社会资源的占有。新马克思主义者希望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内,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进行严格的调整,重新定义阶级,分析不同国家的阶级分布、阶级和职业流动模式、在家庭和工作中的阶级结构和劳动分工、收入不平等、阶级地位及阶级意识等问题。新结构主义认为,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存在着很多分割性的结构因素,这些结构性因素对个人社会经济地位具有重要影响。最为新结构主义所强调的结构性因素,主要是分割的劳动力市场、经济部门和产业部门、内部劳动力市场、组织特质、产品和服务特质、受分割劳动力市场制约的职业经历及其相关因素等。[2]

“网络结构观”的特殊视角在于,它重视人际关系而不重视个人特征;重视人际关系所形成的网络以及人们身处什么网络中,而不重视类别(例如男女或职业);重视人际间的联系性和资源的嵌入性,不看人的归属感;重视个人能够通过这种人际网络摄取多少资源,而不是人们现实占有多少资源;重视人们在网络中的位置或者网络所能使用的资源,而不重视人们的阶级地位。因此,网络结构观是通过人们的行为研究人们的社会地位。[3]

3. 在社会变迁中把握社会分层 大多数社会分层理论都是研究工业化市场经济社会的结果,而对集权体制的社会,包括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社

会分层机制,则缺乏深入的探讨,常常是将有关市场经济社会的分层框架运用于集权社会和国家社会主义社会。集权社会和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不同于市场经济社会:一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不同。在集权社会和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家通过垄断性权力将绝大部分资源控制在手中,利用政治决策在社会中配置资源,从而影响和决定个人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机会。而在市场经济社会中,个人对市场机会的把握继而对社会财富的占有往往起着决定作用,政治权力的掌握一般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二是社会发展的波动性不同。在市场经济社会中,资源的初始禀赋因为私人财产权的稳定而对社会地位产生持续的影响,并且使不同群体的相关机会稳定化;在集权社会和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中,社会群体、组织的界限和相关位置是基于国家政策的考虑而不是市场交换。国家政策对社会分层结构具有明显的影响,国家通过改变社会群体的相关资源来改变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并导致社会流动类型的改变。

因此,要考察集权社会和国家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分层结构,需要考虑到历史因素的变化,即在社会变迁中把握社会分层。分析在不同历史阶段中,国家政治环境对社会分层结构的影响。同时要有前后相继的观念,考察前一阶段的社会分层结构对后一阶段社会分层结构的影响。在社会变迁中把握社会分层同样适用于市场经济社会,因为即使在基本的制度背景保持稳定的情况下,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社会分层结构也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既是社会变迁的结果,又会对未来的社会变迁产生影响。

## 二、中国的社会分层研究

中国的社会分层研究一直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热点。首先,社会分层是社会结构与变迁的一个表征,了解中国的社会分层有助于了解中国的结构与变迁。其次,中国的社会变迁十分急速。自鸦片战争以来,国外侵略势力的进入与国内各派的纷争使中国社会一直处于动荡不安之中。建国后,本来可以把精力集中在经济建设上,但国内政治运动频繁,以致社会发展时进时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但经济领域的深刻变革以及由此引发的政治领域的相应变革又使人们处于不断的利益调整之中。把握中国社会的复杂形势,其重要途径之一就是研究社会分层。

国内外关于中国社会分层的研究很多,这些研究成果是我们了解中国社会结构与变迁的基础。综

合看来,它们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沿用西方社会分层的研究框架。西方社会分层的研究历史较长,研究模式已比较成熟。社会学的鼻祖——马克思和韦伯开创了社会分层的经典研究,后续的研究基本上是在他们的框架内发展,只不过在理论上更加深入,在方法上更加科学。国内学者对中国社会的研究最初处于自发状态,缺乏科学理论和方法的指导。例如,毛泽东的《湖南运动考察报告》对农村阶级构成的分析虽然以第一手材料为基础,研究结果也比较符合客观实际,但科学性不够强。由于越来越强调社会科学研究科学性,国内学者很自然地运用西方社会分层的研究框架进行中国社会分层的研究。二、忽视历史考察。西方自工业革命以来,进入了社会制度尤其是经济制度相对稳定的时期,所以西方社会分层的研究主要是从静态上考察,缺乏动态研究。但中国的情况不同。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就一直处于制度结构的转变之中,从封建制度到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再到社会主义制度。与此同时,中国又正经历着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和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所以,西方关于社会分层的静态考察并不完全适应中国的动态发展,必须将历史因素纳入中国的社会分层研究,在社会变迁中把握社会分层。目前国内学者关于社会分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解放后的这段历史,而且尤以改革开放以来的这20年为主。这些研究尽管有很大价值,但割断与之前历史的联系,是不可能真正把握当下的社会分层结构的。三、对政治权力的强调不够。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封建社会的历史尤其漫长。皇权的不可侵犯必然导致一切以皇帝的意志为中心。从满清王朝被推翻到新中国成立,中国一直处于战乱之中。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时断时续,民族资产阶级始终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级,因此与国家相对的市民社会也一直没有形成。建国以后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这并不是马克思所描述的由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社会主义社会,而是一种国家社会主义社会,国家在社会资源配置中具有决定权。所以中国社会的集权性一直没有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社会分层结构也没有发生本质上的变化,社会分层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受国家政治动力和伴随的国家政策变化的影响。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体制外空间逐渐扩大,个人有了更多的选择自由。但国家并没有放松对社会经济生活的控制,而且由于权力与金钱的某种畸形交换关系,政治权力的影响力又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

综上所述,有关中国社会分层的研究应在借鉴西方社会分层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在社会变迁中予以考察,考察的着重点放在国家政治环境对社会分层结构的影响上。

### 三、在社会变迁中把握社会分层的范例

在社会变迁中把握社会分层是社会分层研究的基本视角之一,将其运用于中国社会,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① 中国社会的分层结构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② 影响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主要因素是政治因素。国家通过垄断性权力将绝大部分资源控制在手中,利用政治决策在社会中配置资源,从而影响和决定个人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机会。③ 中国的社会分层结构变动较大。在中国,由于国家政策对社会分层结构具有明显的影响,国家通过垄断性权力改变社会群体的相关资源来改变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因而同一群体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分层结构中的位置变化很大。所以在考察中国社会分层结构时,一定要先考察中国历史,尤其要着重考察国家政权的更替引起的国家政策的改变对社会分层结构的影响。

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是世界上最负声望的中国问题观察家。《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年)是费正清的主要著作之一,这本书的主要目的正如费正清在前言中指出的:“总应该有人把过去和现在联系在一起,特别是把19世纪的中华帝国,同1911年以后的中华民国和1949年以来的人民共和国联系在一起。”[4]与其主要目的的达成并行不悖的是,在这本书里,费正清以历史学家特有的眼光,以及其自觉的社会分层意识向我们揭示了社会变迁中的中国社会分层结构。还是如其在前言中所说的:“帝制时代的机构,可能以新的名目重新出现。例如古代互相监督的保甲制度,今天就会变成街道办事处,或者20世纪以前的下级士绅后来变成了民国时代的土豪劣绅,以及成为继他们之后而出现的党员干部和今天的农村党委书记。”[5]所以认真剖析费正清的《伟大的中国革命》可以使我们了解如何在社会变迁中把握社会分层结构。

1. 晚期的中华帝国:成长和蜕变 1800~1895年 从1644到1911年,中国处于满清政府的统治之下。同蒙古族建立的元朝一样,外族的贵族阶层占据了中华帝国的统治地位。但中国依旧是封建社会,政治上皇权至上,经济上地主剥削农民,文化上以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儒家文化为主。中国社会的分层结

构是由皇帝、上层士大夫、下层士大夫和普通老百姓构成的自上而下的连续统一体。但“到了20世纪,特别自1905年废止科举考试之后,地方绅士变成村里的强人和恶霸,他们凭借权势,勒索敲诈。他们的横征暴敛反转过来使他们与普通百姓越来越疏远。低级士绅本来是维护和承认上下级之间的相互依附的,现在变得无法无天,只求自己富裕。”[6]与此同时,国内市场的形成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群体出现了。“中国国内市场的兴起可以从各种专业化的商人群体的成长来衡量,诸如批发商、零售商、走南闯北的行商,上面还有层层的主客和代理人,他们为不同地区间的贸易服务。”[7]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以后,中国由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满清政府对中国的控制力减弱,外国侵略势力开始渗入到中国的各个领域,社会分层结构发生了一系列相应的变化。外国与中国之间贸易的迅速发展,需要雇佣中间人,即买办。“买办们凭他们同外国人的关系和保护,变成了中国第一批现代经营家。他们投资到通商口岸的各种新兴事业,有时候比他们的外国老板还要阔绰得多。”[8]为了挽救岌岌可危的满清王朝,抵抗国外侵略势力,上层士大夫发起了洋务运动,“现代化只有少数地方高级官员去干,一半因为这适宜于中央与地方两者的平衡——朝廷可免得出钱和负责任,一半因为只有那些和外国人接触的商埠官吏,才看得出机会,并取得外国的帮助。”[9]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李鸿章、张之洞等人将手中的权力和私人商业资本相结合,形成了最初的官僚资本主义,官僚资产阶级开始在中国崭露头角。

**2. 晚清帝国秩序的变革 1895~1911年** 面对内忧外患的中国,中国普通人民对政府无所贡献,而大多数士绅囿于习惯势力,不能提供思想指导,因此知识分子的崛起成为必然。以康有为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团结起来,为中国发展献计献策。但中国的知识分子大多是依附统治阶级的,如果统治阶级地位不保,他们的任何努力都会付诸东流。戊戌变法正是最好的历史证明。“等到差不多全部朝廷官员人人自危的时候,她一下子发动了军事政变。她把光绪囚禁在中南海南边的一个小岛上(70年后另一个国家首脑刘少奇几乎关囚在同一地方),杀死了她能抓住的急进派。康、梁逃到日本。”[10]

1898年改革运动以后,跟着来的是反动,到处闪烁着民族主义。这明显地见之于反对帝国主义、要求修改条约和恢复权利的斗争,在国内问题上则见

之于孙中山领导的推翻满清政府的努力。表现在社会分层上,“在旧中国的社会结构中,在原有的儒生—农民—手艺人—商人范畴之外,军人有了新的社会地位;军官学校出身的军官,取得了过去只给儒生保留的一些特权。地主士绅和商人之间的界限模糊起来了。现在商人绅士也有了一定的地位,正像官吏和商人的身份笼统地称官商一样。廉价的农村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从事纺织和烟草制作,工厂工人阶级开始产生,虽然他们还不可能组成无产阶级。最重要的是,科举考试的废除,新的学校制度、教会学校的出现……总的说来,城市生活正在产生一个新的知识分子阶层,他们再也不和四书五经的考试结合在一起。他们中有些人成了新闻记者,这是一个制造舆论的新专业。孙中山本人正在把自己铸造成一个新的角色——职业革命家、政党组织者的先驱。”[11]

**3. 第一次中华民国时期 1912~1949年** 满清王朝被推翻后,袁世凯上台,但他出卖共和,继续延续帝制,逆历史潮流而动。1916年袁世凯死后到1928年国民政府统一这12年中,是军阀混战时期,老的绅士、商人、官吏统治阶级没有能力在一个全国范围的新的政治组织基础上团结起来,学生、教育者、农村有实力者、城市商人、政府公务员、工人及军人成为中国的政治主体。在20世纪初至20年代,一个由商人、银行家、工业家和现代职业人士构成的中国资产阶级已经脱颖而出,但1928年国民革命导致南京政府上台之后,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很快结束了。国民政府主要代表的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

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统一战线破裂之后,逐渐认识到中国革命的主力既不是产业资产阶级,也不是无产阶级,而是农民,于是积极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积聚革命力量。国民政府欲除后患,疯狂围剿革命根据地。日本入侵使对峙的国共两党重新合作,第二次统一战线形成。抗战结束后,国共两党都力图争夺中国的领导权,内战不可避免地爆发了。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实行土改,地主的土地被没收,其社会经济地位迅速下降。与此同时,贫农中的积极分子则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提高了地位,控制着农村。富农被中立化,或被削弱。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分化战略赢得了广大民众的支持,国民党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日渐衰落,国共两党的力量对比向有利于共产党的一方转化。尽管有美国的支持,失去民心的国民党战败逃亡的下场不可避免。

**4. 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1985年** 中华人民

共和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一社会制度必然在社会分层结构中反映出来。“1951—1952年的‘三反’运动(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就是针对政府机构、工业和党的官员而进行的。同时开展的‘五反’运动则是打击起初也允许其存在的资本家阶级。”[12]“当这种渐进的、零星的、各地不同的、有时候可怕的巩固过程在城市和现代经济领域里进行的时候,另一种平行巩固的过程则以土地改革形式在农村里进行。……在军事上平定之后,工作队就进入农村,把农民组织起来,打击和消灭了地主。此时富农不仅没受打击,而且还受了照顾。”[13]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学者与国家之间的密切关系。在1957年夏天,知识分子对共产党政权发了相当多的牢骚以后,毛泽东就把阶级斗争的矛头转移到那些不服管束的知识分子身上,使他们成为反右的对象。“要试图理解这个冷酷无情的历史故事,一种方法是把它看成一种阶级斗争,即代表群众的新上台的人和那些曾参加过统一战线并贡献过高级技能的现代化的统治阶级的残余这两者之间的阶级斗争。”[14]1958至1960年的大跃进及随后的经济整顿使中国经历了一个轮回。然而毛泽东仍然认为修正主义在中国已很严重,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仍要继续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起的。在文革中,有三个社会阶层值得关注:一是军人。军人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人民解放军已成为农村人口向社会上层升进的一个主要渠道。”[15]二是青年学生。文革的主力军是十几岁的青年学生,这些没有经验的青年,在“干革命中学革命”,有着巨大的破坏力。最后还是借助了人民解放军之力,才将他们镇压下去。“红卫兵”解散后被大批遣往山区和农村,从政治上层一下跌入社会底层。三是共产党领导层中与毛泽东观点不一致的重要领导。他们被打成右派,受到非人的折磨,有的甚至被

迫害致死。文革结束后,邓小平的上台使中国进入经济发展的平稳期。共产党为1957年及以后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几十万人“平反”,并恢复他们的党籍和职位,同时努力吸收知识分子和有专长的技术人员入党。全方位的改革开放,使原来比较均质的各个阶层发生内部分化,同时阶层之间的差异也越来越大,并且出现了一些新的阶层。关于这一时期社会分层结构的研究,国内学者做得比较深入。

费正清的《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向我们展示了中国历史上巨变时期的真实图景。在这一图景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社会分层结构随着政治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有些社会阶层的地位上升了,而有些社会阶层的地位下降了;新的社会阶层出现了,旧的社会阶层退出了。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化展现了社会变迁的轨迹。当然由于费正清更注重描述历史事件,而没有深入分析每一阶层的特点,及其上升或下降、出现或消亡的原因,所以我们只能了解一定历史背景下的社会分层结构的大概。另外,费正清代表的是美国的中国观察家。尽管局外人看中国可以获得局内人所没有的客观性,但由于对中国文化背景缺乏深入了解及对历史事件缺乏直接体验,有些看法难免有失偏颇。但无论如何,费正清的研究对想进一步客观深入地分析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学者是极具启发意义的。我们应该加强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在社会变迁中把握社会分层结构,并能够通过社会分层结构的演变,对未来中国的发展趋势作出合理预测。

#### 参考文献:

- [1][2][3]李路路.论社会分层研究[J].社会学研究,1999,(1).  
 [4][5][6][7][8][9][10][11][12][13][14][15]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年)[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

[责任编辑 陈萍]

## Study on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Change

FAN Hai-ling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re are three basic perspectives in the study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 They are the analysis on decisive elements, the structural analysis and the historical analysis. To underst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structure in power-concentrated society or national socialist society, it is necessary to examine its history, that is, to grasp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social change. Taking the Chinese study of John King Fairbank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describes social stratification study in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change.

**Key words:** social change; social stratification; Chinese study